

DHSF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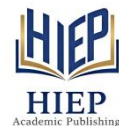
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DHSFS, Vol. 1, No. 1, 2026, pp. 94-104.

Print ISSN: 3105-1278; Online ISSN: 3105-128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dhsfs.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DHSFS.26.1.08>



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沙丘》三部曲的文化解读

江玉梅 (Jiang Yumei)

摘要：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三部曲（《沙丘》、《沙丘救世主》、《沙丘之子》）作为科幻文学史上的史诗级作品，以遥远未来的星际文明为载体，融合多元宗教文化元素，重构经典神话原型，构建起兼具宗教哲思与文明隐喻的叙事体系。本文以宗教符号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为研究视角，系统拆解作品中核心宗教符号的文化内涵，分析其对东西方神话原型的重构策略，探讨宗教符号与神话叙事在塑造人物、推动情节、传递文明反思中的核心作用，揭示作品背后关于信仰、权力、生态与人类命运的深层思考。研究表明，赫伯特通过对宗教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和神话原型的现代化重构，既延续了人类文明中宗教与神话的精神内核，又结合科幻语境完成了对传统宗教神话的解构与超越，为科幻文学的文化解读提供了典型范本与全新视角。

关键词：《沙丘》三部曲；宗教符号；神话重构；文化隐喻；科幻文学

作者简介：江玉梅，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商务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科幻文学。电邮：jiangyumei1984@szpu.edu.cn。

Title: Religious Symbols and Myth Reconstruction: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Dune Trilogy*

Abstract: Frank Herbert's *The Great Dune Trilogy* (*Dune*, *Dune Messiah*, *Children of Dune*), an epic work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takes the interstellar civilization in the distant future as the carrier, integrates divers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elements, reconstructs classic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and builds a narrative system with both religious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al metap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ligious semiotics and mythological

Received: 04 Mar 2026 / Revised: 12 Mar 2026 / Accepted: 09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archetype criticis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ecompos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core religious symbols in the first three volumes of *Dune Chronicles*, analyzes the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explores the core role of religious symbols and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in shaping characters, promoting the plot, and conveying reflections on civilization, and reveals the in-depth thinking behind the work on faith, power, ecology and human destin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rough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symbols and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Herbert not only inherits the spiritual core of religion and mythology in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completes the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mythology in the context of science fiction, providing a typical model an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Great Dune Trilogy*; religious symbols; myth reconstruction; cultural metaphor;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uthor Biography: Jiang Yumei,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Business in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 and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E-mail: jiangyumei1984@szpu.edu.cn.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创作的《沙丘》(*Dune*, 1965)、《沙丘救世主》(*Dune Messiah*, 1969)与《沙丘之子》(*Children of Dune*, 1976)三部曲,以宏大的世界观建构、深刻的思想内涵,超越传统科幻文学边界,成为科幻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范本。不同于普通科幻作品对科技奇观的侧重,《沙丘》三部曲将宗教、神话、政治、生态等多元元素深度融合,以厄拉科斯星球的沙漠文明为核心,构建起跨越数千年的星际史诗,其中宗教符号的密集呈现与神话原型的创造性重构,构成作品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特征。

在《沙丘》三部曲的叙事世界中,宗教是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千年阴谋;弗雷曼人的沙漠信仰;保罗·厄崔迪的弥赛亚叙事;以及雷托二世的神帝崇拜,均与宗教符号深度绑定。神话重构则是赫伯特传递思想的重要载体,他借鉴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等东西方宗教神话元素,对弥赛亚、英雄、创世等原型进行改造,赋予其科幻语境下的全新内涵。巴特(1999)认为神话是一种被自然化的意识形态,它将特定的文化建构伪装成自然的、普遍的存在,通过符号的编码与解码实现意识形态的渗透。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往往以未来叙事为外壳,将人类文明的核心命题与文化基因融入其中,通过符号建构与原型重构,“帮助人类建立对存在的认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身与宇宙万物关系的认识”(霍盛亚,2025, pp. 215-216)。《沙丘》三部曲中的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正是这种“神话化”过程的典型体现,其将权力意志、生态理念与信仰诉求隐藏在科幻叙事的符号体系中,使读者在接受故事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感知作品的文化内涵与思想倾向。

当前国内学界对《沙丘》三部曲的研究多集中于单部作品的生态思想、政治隐喻或影视改编,国外学者主要围绕生态伦理、权力政治、救世主叙事及人性异化四大核心维度展开。例如,将《沙丘》与《指环王》并列为“现代神话”的典范,研究学者认为赫伯特通过保罗·厄崔迪从救世主到自我放

逐的悲剧，深刻探讨了“绝对力量对人性的异化与操控”（Bloom, 1994, p. 47）。也有学者聚焦生态叙事，指出“厄拉科斯的沙虫-香料-沙漠生态闭环，是赫伯特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传递生态共生理念的核心载体”（Kennedy, 2022, p. 41）；Nicholas（2011）研究中指出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基因计划，隐喻了技术理性对人性的侵蚀。目前的研究针对《沙丘》三部曲的宗教符号系统拆解与神话重构逻辑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匮乏，且多未充分结合作品整体性叙事脉络，难以展现二者在整部史诗中的递进关系与核心价值。

基于此，本文以《沙丘》三部曲为研究对象，以宗教符号学和神话原型批评为核心理论工具，梳理核心宗教符号的类型与内涵，分析神话重构的具体策略与表现形式，探讨二者如何协同作用，完成对人类文明、信仰本质与命运走向的深层反思。本文的研究意义通过分析作品中宗教符号与神话元素的创造性转化路径，为科幻文学的文化创作与研究提供新思路与借鉴，并且丰富《沙丘》三部曲的文化解读维度。

一、宗教符号的建构与内涵：《沙丘》三部曲的文化编码

宗教符号作为宗教信仰的具象化表达，是承载宗教理念、传递文化内涵的核心载体。《沙丘》三部曲中，赫伯特构建了一套庞大而严谨的宗教符号体系，这些符号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构成作品的文化编码系统。从符号学视角，可将其分为自然符号、人造符号与人物符号三大类，每一类均蕴含深厚的宗教文化内涵与文明隐喻，是解读作品思想的关键钥匙。

（一）自然符号：生态与信仰的共生隐喻

自然符号是《沙丘》三部曲宗教符号体系的基础，以厄拉科斯星球的自然景观与生物为载体，核心为沙虫（夏胡鲁）与香料（美琅脂）。二者既是厄拉科斯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也是弗雷曼人宗教信仰的核心图腾，承载着生态与信仰共生的深层隐喻。

沙虫（夏胡鲁）作为厄拉科斯特有巨型生物，是作品最具标志性的自然宗教符号。在弗雷曼人信仰体系中，沙虫被尊为“夏胡鲁”（源自阿拉伯语“不朽之物”），视为神的化身、宇宙秩序与生命力量的象征。弗雷曼人坚信，沙虫是沙漠灵魂与生命守护者，其活动维系着生态平衡，死亡则意味着沙漠文明覆灭。这种崇拜源于弗雷曼人与沙虫的共生智慧：沙虫幼虫（沙鳟）可转化沙漠水分，为弗雷曼人提供生存资源；弗雷曼人死后将尸体投入沙虫口中，视为“回归神的怀抱”，完成生命轮回，这与伊斯兰教“万物有灵”、佛教“轮回转世”理念深度契合。赫伯特（2024a）在《沙丘》中明确描述了弗雷曼人对沙虫的崇拜仪式，将沙虫的每一次出现都视为神的降临，甚至规定不可伤害沙虫，违者将被逐出部落，以此强化沙虫的神圣性。同时，沙虫具有双重性，既是信仰图腾，也是毁灭象征，其破坏力隐喻着信仰的两面性——既能给予生存力量，也可能成为支配人类的工具。巴特（1999）认为符号的神话化本质是将历史转化为自然，沙虫这一自然符号的宗教化建构，正是将厄拉科斯星球的生态现实（沙虫维系生态平衡）转化为弗雷曼人信仰中的“神圣自然”，使沙虫的存在被赋予超越自然本身的宗教意义，成为支撑弗雷曼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图腾。

香料（美琅脂）作为厄拉科斯独特产物，是另一核心自然宗教符号，兼具星际核心资源与宗教精神载体的双重属性。香料延长寿命、增强感知、激发预知的神奇功效使其成为星际航行、贵族统治与宗教修行的必备之物，其实是隐喻现实世界的石油政治与资源垄断。赫伯特以香料为核心符号，构建了现实世界石油政治的科幻镜像，将星际势力对香料的争夺，映射为20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中东石

油资源的殖民式掠夺，Kennedy（2021）研究发现弗雷曼人作为香料产地的原住民，其生存困境与反抗斗争，正是中东地区原住民反抗殖民压迫、捍卫自身资源主权的文化隐喻。在宗教语境中，香料被赋予神圣意义：对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它是完成“生命之水”仪式、唤醒“祖先记忆”的关键；对弗雷曼人，它是夏胡鲁的“圣物”，是与神对话的媒介；对保罗·厄崔迪，它是觉醒预知能力、成为弥赛亚的核心条件。从符号学角度，香料象征“神圣的恩典”，与基督教新教中的圣餐、伊斯兰教《古兰经》同为人类获得神圣力量、实现精神救赎的媒介。其成瘾性则隐喻信仰异化，为后续批判盲目信仰埋下伏笔。

厄拉科斯沙漠本身也是重要自然宗教符号。作为极端环境的代表，沙漠是弗雷曼人生存家园与信仰试炼场，被视为“净化灵魂的圣地”，只有通过沙漠试炼，才能获得神的认可。沙漠的广袤与残酷，隐喻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与孤独，也象征信仰之路的艰难漫长，体现赫伯特对东方“天人合一”理念的借鉴，传递敬畏自然、共生共赢的生态思考。

（二）人造符号：教义与权力的话语建构

人造符号是宗教符号体系的核心，以宗教教义、仪式、典籍为载体，是宗教信仰的制度化体现，也是权力话语建构的重要工具。《沙丘》三部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人造宗教符号包括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教义与仪式、弗雷曼人的宗教典籍与习俗、帝国官方宗教《奥兰治天主教圣经》。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教义与仪式是人造宗教符号的核心代表。其教义融合多元宗教元素，核心是“基因提纯计划”与“魁萨茨·哈德拉克”预言（意为“捷径之法”），“魁萨茨·哈德拉克”能同时拥有男女祖先记忆、预见未来、跨越时空的“超级人类”，是姐妹会千年培育的“救世主”。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教义与仪式始终围绕“弥赛亚计划”展开，其将神秘主义信仰与基因操控、政治野心深度绑定，通过传播预言、塑造神圣仪式，将自身建构为弥赛亚的培育者与引导者，其本质是借助宗教神秘主义实现权力的隐性操控。这一教义既是信仰核心，也是权力工具——姐妹会通过传播预言，在各星球植入信仰，操控民众思想，服务于基因计划与政治野心。其“戈姆刺测试”（入门仪式，考验意志力）与“生命之水”仪式（圣母晋升仪式，唤醒祖先记忆），分别象征“灵魂净化”与“神圣传承”，隐喻宗教信仰中“牺牲与重生”的核心主题，本质是权力话语的规范化建构。

弗雷曼人的宗教典籍与习俗是另一类重要人造符号。《求生-宗教手册》作为弗雷曼人世代传承的核心典籍，并非单纯的生存指南或宗教经文，其承载的人造符号的意义，早已超越文字本身——这些人为创造的符号，是弗雷曼人将生存本能、宗教敬畏与族群认同融为一体的载体，是他们对抗恶劣环境、维系文明存续、构建精神秩序的核心工具，更是人造符号服务于人类生存与精神需求的极致体现。“水文化”习俗将水视为“神圣生命之源”，实行严格水资源管理，甚至提取死者水分供部落使用，象征神的恩赐与生命轮回，与基督教圣水、伊斯兰教净水具有相似内涵；“骑乘沙虫”仪式是成为战士的标志，象征“人与神的合一”，是其信仰的最高体现。

帝国官方宗教《奥兰治天主教圣经》，核心教义为“逻辑与理性的和谐”“人类不可被替代”“多元信仰共存”，包括穆美萨利教、基督教、禅逊尼天主教以及伊斯兰教传统。其多元融合特点体现赫伯特对宗教包容的思考，同时隐喻权力对宗教的操控——宗教成为统治工具，教义解读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民众信仰被支配。

（三）人物符号：信仰与命运的具象化表达

人物符号是宗教符号体系的具象化体现，核心人物被赋予宗教神话的神圣属性，成为信仰象征与

命运化身，其命运轨迹与性格转变，是宗教信仰与人类命运的具象表达。核心人物符号包括保罗·厄崔迪（穆阿迪布）、雷托二世（神帝）与贝尼·杰瑟里特圣母。

保罗·厄崔迪（穆阿迪布）是核心人物符号，也是弥赛亚原型的具象化。家族覆灭后，他逃亡至厄拉科斯沙漠，成为弗雷曼人，被尊为“李桑·阿尔·盖布”（天外之音、救世主），这一称号源自伊斯兰教先知传统。其命运轨迹契合弥赛亚神话：历经苦难、获得神圣力量（香料唤醒预知能力）、带领弗雷曼人反抗压迫。值得注意的是，保罗掌握的音控力作为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核心技能，既是其摆脱困境、获得认可的关键，也是其弥赛亚身份建构的重要象征，“这一符号承载着‘因言成事’的宗教隐喻，与《圣经》中上帝以言辞创造世界的母题形成深层互文”（李俊义，2022，p. 41），彰显了宗教符号在人物塑造与叙事推进中的核心作用。同时，保罗具有复杂性，既是信仰化身，也是信仰异化的受害者——他预见圣战将导致数百亿人死亡，却无法摆脱命运枷锁，最终被信仰裹挟，隐喻弥赛亚神话的内在矛盾，体现赫伯特对盲目信仰的批判与对信仰与自由意志关系的思考。此外，保罗的人物形象还兼具反英雄特质，他打破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音控仅女性可掌握”的规训，摆脱各方势力的预设与束缚，在身份的迷茫与挣扎中完成自我重构，这一特质也印证了《沙丘》通过人物符号解构传统英雄叙事、探讨自由意志的深层内涵。

雷托二世（神帝）是“神化”与“牺牲”原型的具象化，继承保罗的预知能力与命运枷锁。赫伯特（2024b）在《沙丘救世主》中，描写保罗曾在预知幻象中看到儿子将承载双重灵魂，一半是人，一半是夏胡鲁，以牺牲换取人类的未来，这一预言成为雷托二世后续与沙虫融合、成为神帝的核心铺垫。《沙丘之子》中，雷托二世在与沙虫融合的过程中，清晰感知到自身人性的消融与神性的觉醒，坦言“我不再是单纯的雷托，我是夏胡鲁的化身，是人类命运的载体，我的牺牲不是终结，是新生”（赫伯特，2024c，p. 495）。为拯救人类文明，他选择与沙虫融合，成为半人半虫、长生不老的“神帝”，以绝对权力推行“金色通道”计划初始阶段，强迫人类接受苦难、磨练意志。其双重性显著：既是人类文明的拯救者，以牺牲人性为代价守护未来；也是压迫民众的“暴君”，剥夺人类自由，成为信仰的绝对权威。这种双重性隐喻权力与信仰的辩证关系，其牺牲与基督教耶稣受难、佛教释迦牟尼涅槃具有相似内涵，体现赫伯特对“牺牲与救赎”主题的深刻思考。保罗与雷托二世的人物塑造，深刻体现了后人文语境下科幻文学对“人”的多元书写，“人与非人的僵化边界消失，既是对人类的本体论的威胁，也表明关于人的本质的向度是建构出来”（魏悦、何敏，2021，p. 72）。既展现了人类在命运与信仰中的挣扎，也探讨了人性异化与自我超越的可能。

贝尼·杰瑟里特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杰西卡夫人）是“智慧”与“神秘”的象征，也是宗教权力的具象化。她们通过“生命之水”仪式唤醒祖先记忆，兼具教义传承者与姐妹会政治野心执行者的双重身份。贝尼·杰瑟里特圣母作为姐妹会弥赛亚计划的核心执行者，其自身的神秘主义修行与身份矛盾，既体现了姐妹会教义的神圣性，也暴露了其政治野心的功利性，成为宗教符号与权力博弈的具象化体现。杰西卡夫人跨越两个宗教群体，成为信仰桥梁，其命运体现宗教信仰与母性本能的冲突与融合；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则是宗教权力的代表，冷酷理智、不择手段，隐喻宗教权力的异化。

二、神话重构的策略与表现：《沙丘》三部曲的叙事创新

诺斯洛普·弗莱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继承了强烈的上古神话色彩的传奇小说”（Frye, 1957, p. 33）。神话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源头，承载着人类对世界起源、命运、善恶的基本思考，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科学与神话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在互动中相互滋养、彼此成就，科幻文学正是二者互动融合的典型载体，既以科学想象为根基，又以神话原型为精神内核，因此“神话与科学在科幻小说中是一种共生关系”（黄悦, 2020, p. 40）。赫伯特在《沙丘》三部曲中，并未简单复制传统神话原型，而是结合科幻语境与自身思考，通过“原型借用—语境转化—内涵延伸”的策略，对东西方经典神话原型进行创造性重构，赋予其全新时代内涵与叙事功能，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传递思想内涵。重构主要集中在弥赛亚神话、英雄之旅神话和创世神话。

（一）弥赛亚神话的重构：从“救赎”到“异化”的辩证叙事

弥赛亚神话是东西方宗教神话的核心原型，核心内涵是“救世主降临，拯救民众于苦难，实现世界救赎与和平”，基督教耶稣、伊斯兰教穆罕默德、犹太教弥赛亚均是这一原型的具象化。赫伯特以其为原型，塑造保罗、雷托二世等“救世主”形象，突破传统“救赎”叙事，加入“信仰异化”“命运枷锁”元素，构建从“救赎”到“异化”的辩证叙事，实现对传统神话的解构与超越。

首先，重构体现为“救世主身份的人为建构”。传统弥赛亚身份是“神圣授予”，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性；而保罗的弥赛亚身份，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通过“传教保护计划”长期策划的结果——姐妹会在各星球植入“外来救世主”预言，尤其在弗雷曼人中传播“李桑·阿尔·盖布”传说，为保罗降临铺垫信仰基础。保罗的出现契合预言，加之香料赋予的预知能力与骑乘沙虫的勇气，被弗雷曼人坚信为“救世主”。这种人为建构打破了传统神话的神圣性，揭示弥赛亚神话的本质：既是民众对希望的渴望，也是权力集团操控民众的工具。巴特（1999）在研究中认为所有神话都是人为建构的文化产物，所谓“神圣性”不过是权力集团通过符号编码赋予的意识形态外衣。保罗的弥赛亚身份，正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通过预言编码建构的神话，其“神圣性”本质上是服务于权力操控的意识形态伪装。

其次，重构体现为“救赎与毁灭的辩证统一”。传统弥赛亚的核心使命是“救赎”，以牺牲实现世界和平；而保罗的“救赎”伴随巨大毁灭——他带领弗雷曼人发动的圣战，虽推翻哈克南家族与帝国统治，为弗雷曼人争取生存空间，却导致数百亿人死亡，星际文明陷入混乱。保罗预见一切却无法摆脱命运，意识到自己既是“拯救者”，也是“毁灭者”，信仰成为灾难根源。这种辩证统一打破传统理想化叙事，揭示信仰的两面性，批判盲目信仰，探讨信仰与理性的挣扎。保罗直面自己引发的圣战灾难，坦言“我是拯救者，也是毁灭者”（赫伯特, 2024b, p. 298）。直白道出弥赛亚身份的内在矛盾与信仰异化的危害。

最后，重构体现为“救世主的自我解构”。传统弥赛亚完美神圣，是人类榜样；而保罗与雷托二世均非完美救世主，充满挣扎与局限。保罗成为救世主后，陷入信仰迷思，无法控制狂热，最终遁入沙漠自我放逐，解构救世主身份；雷托二世为拯救人类，牺牲人性成为“神帝”，虽开启拯救之路，却沦为“暴君”，其牺牲本质是对救世主身份的解构。在推行“金色通道”计划时，深刻认识到自身救世主身份的悖论，雷托二世对杰西卡坦言救世主是逃避责任的幻象，“为什么要神化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凡人？”（赫伯特, 2024c, p. 3）这体现赫伯特的深刻反思：世界上没有完美救世主，人类救赎最终只能依靠自身。

（二）英雄之旅神话的重构：从“个人英雄”到“文明觉醒”的叙事升级

英雄之旅神话是人类文学最古老的叙事原型，核心模式是“英雄历经磨难，获得成长与力量，完成使命，实现自我与群体救赎”，约瑟夫·坎贝尔（2000）将英雄之旅模型分为启程—启蒙—回归三个阶段。赫伯特以其为原型，塑造保罗、雷托二世等英雄形象，打破传统“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实现从“个人英雄”到“文明觉醒”的叙事升级。

首先，重构体现为“英雄使命的升级”。传统英雄使命多为“个人救赎”或“群体救赎”，核心是个人成长与牺牲；而《沙丘》三部曲中，英雄使命上升到“人类文明的觉醒”。保罗的英雄之旅，从“为家族复仇”转变为“带领弗雷曼人反抗压迫”，最终上升到“反思信仰异化，探寻人类文明未来”；雷托二世的使命，从“继承父亲使命”转变为“牺牲自己，为人类文明开辟‘金色通道’”，聚焦整个人类文明的救赎与觉醒，打破传统叙事的狭隘性，将个人命运与文明命运紧密结合。

其次，重构体现为“英雄成长的复杂性”。传统英雄成长呈“线性”，从弱小到强大、从迷茫到坚定，最终完美；而《沙丘》中的英雄成长呈“非线性”，充满矛盾与挣扎。保罗经历家族覆灭、沙漠逃亡、预知未来的迷茫，曾沉迷救世主身份引发圣战，也试图反抗命运却无能为力；雷托二世经历父亲离去、民众期待、预知未来的痛苦，牺牲人性成为“神帝”，兼具拯救者与暴君双重身份。这种复杂性打破理想化叙事，展现人类在命运与选择间的挣扎，反思“英雄”的本质——英雄并非完美象征，其成长是人类自我反思、觉醒的过程。

最后，重构体现为“英雄与群体的相互依存”。传统英雄多“孤独”，成长与使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群体只是拯救对象；而《沙丘》中，英雄与群体相互依存：保罗的成长离不开弗雷曼人的支持与信任，弗雷曼人的觉醒也离不开保罗的引导；雷托二世的使命离不开各方势力配合与民众隐忍，人类文明的觉醒也离不开其牺牲与引导。这种关系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强调群体力量的重要性，体现赫伯特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思考——文明进步依靠全体人类的共同努力与自我觉醒。

（三）创世神话的重构：从“神创世界”到“人创文明”的价值转向

创世神话是东西方宗教神话的基础原型，核心内涵是“上帝创造世界，制定宇宙秩序，人类是上帝的产物，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核心是“神本主义”，强调上帝的至高无上与人类的被动性。赫伯特对其进行创造性重构，打破“神本主义”叙事，实现从“神创世界”到“人创文明”的价值转向。

首先，重构体现为“宇宙秩序的人为建构”。传统创世神话中，宇宙秩序是神创造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沙丘》的星际文明，是人类经历巴特勒圣战（反对人工智能）后逐步建立的，政治、宗教、生态秩序均由人类制定。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通过教义传播与基因培育建构宗教秩序，帝国通过武力与宗教建构政治秩序，弗雷曼人通过与自然共生建构生态秩序。这种人为建构打破“神本主义”，强调人类主观能动性，凸显人类是自身命运的主人。巴特（1999）提出神话的解构核心是剥离其自然化的外衣，还原其人为建构的本质，赫伯特对创世神话的重构，正是剥离了“神创世界”的自然化伪装，还原了文明秩序“人为建构”的本质，凸显了人类的主体地位。

其次，重构体现为“生命起源的生态化叙事”。传统创世神话中，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与自然相互分离；而《沙丘》中，生命起源是生态演化的结果，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共赢。厄拉科斯生态系统由沙虫、沙鳕、香料、沙漠植物与人类共同构成，各生命相互制约、维系平衡。弗雷曼人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将沙虫视为神的化身、水视为生命之源，这种生态化叙事打破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体现赫伯特的生态哲学思想。

最后，重构体现为“文明传承的人文主义转向”。传统创世神话中，文明传承是神的意志体现，人类只能传承教义与智慧，无法创新；而《沙丘》中，文明传承是人类自身的努力与自我超越。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基因计划，是人类对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弗雷曼人的文明，是其在极端环境中探索形成的生存智慧与信仰体系；保罗与雷托二世的努力，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反思与突破。这种转向打破“神本主义”，强调人类主体地位，凸显人类通过自身努力传承、创新文明的能力。

三、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的文化价值：《沙丘》三部曲的文明反思

赫伯特在《沙丘》三部曲中，通过宗教符号建构与神话原型重构，打造了复杂的科幻叙事世界，更传递了对人类文明、信仰本质、权力博弈、生态保护等重大问题的深刻反思。二者作为核心文化载体，其文化价值不仅体现于文学创作创新，更体现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启示，为当代文明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一）对信仰本质与权力博弈的反思：信仰与权力的辩证关系

《沙丘》三部曲以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为载体，将对信仰本质的探寻与对权力博弈的批判深度融合，深刻剖析了信仰与权力的辩证关系，既彰显信仰的积极价值、揭露其异化风险，也批判权力的贪婪本质。信仰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支柱，其核心价值在于为困境中的人类提供精神寄托与力量支撑，这一点在弗雷曼人的生存实践中得到鲜明体现：在极端恶劣的沙漠环境中，弗雷曼人凭借对夏胡鲁的崇拜、对水的敬畏以及对“李桑·阿尔·盖布”的期待，凝聚族群力量、坚守文明存续，更以信仰为纽带团结一心，反抗外来压迫，充分印证了信仰作为人类实现自我超越、维系族群存续的重要动力的本质。

但信仰的价值始终与权力紧密绑定，其积极意义的实现离不开对权力的约束，而权力的滥用则必然导致信仰异化。作品中，各类宗教符号与神话原型本质上都是权力博弈的核心工具：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通过传播预言、建构教义，将信仰转化为操控民众思想、推行基因计划与政治野心的隐性手段；帝国借助《奥兰治天主教圣经》整合信仰、控制民众，维护自身统治；哈克南家族破坏弗雷曼人信仰、掠夺香料，争夺星际霸权；保罗与雷托二世则通过弥赛亚神话、神帝崇拜获得民众支持，实现对星际文明的掌控。这种权力对信仰的操控，直接引发了信仰的异化——保罗被弥赛亚身份裹挟，引发大规模圣战造成巨大伤亡；雷托二世以神帝崇拜实行绝对统治，剥夺人类自由；民众在盲目信仰中丧失自我判断，沦为权力与信仰的双重奴隶，赫伯特深刻揭示了现实中殖民主义通过信仰渗透原住民，实现资源掠夺的逻辑。

信仰与权力两者是辩证关系，权力可以影响信仰，信仰同样可以成为制约权力、反抗压迫的力量。例如弗雷曼人正是凭借坚定的信仰凝聚共识，打破了哈克南家族与帝国的殖民压迫，捍卫了自身的文明与生存权；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虽借信仰获取权力，却也因偏离信仰本质、滥用权力而面临民众反抗的困境。赫伯特通过这一系列叙事，传递出深刻的双重反思：信仰本身无对错，其价值在于坚守精神内核而非陷入盲目，在于赋能人类而非束缚自我；权力本身无善恶，关键在于是否被规范使用，是否服务于文明进步而非个人野心。人类唯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让信仰制约权力、让权力服务于信仰，才能规避异化风险，让信仰与权力共同成为推动文明前行的力量。

（二）对生态文明的倡导：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赢

生态问题是《沙丘》三部曲的核心关注点之一，作品通过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传递人与自然的共

生共赢的生态哲学思想，倡导人类树立正确的生态观，敬畏自然、尊重生命。

沙虫、香料、沙漠等自然符号，均承载生态隐喻，展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沙虫维系厄拉科斯生态平衡，其活动促进沙漠生态循环、产生香料；香料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见证，是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生存的资源；沙漠作为弗雷曼人家园，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舞台，弗雷曼人凭借生存智慧，与沙漠、沙虫和谐共处。Smith（2024）通过从禅宗思想分析《沙丘》，倡导自然自主、批判科技干预与全球化、坚守万物平衡。厄拉科斯星球的生态叙事，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生态掠夺与殖民逻辑，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是抵御生态危机、实现文明延续的核心。这些内容体现赫伯特的生态哲学——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依存、制约，人类不能征服、破坏自然，而应敬畏、尊重自然，实现共生共赢。

同时，作品通过神话重构，倡导正确的生态观。对创世神话的重构，将生命起源视为生态演化的结果，打破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对英雄之旅神话的重构，将英雄使命与生态保护结合，强调人类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与义务。Senior（2007）指出赫伯特通过弗雷曼人的生态实践与宗教信仰构建了一种“生态救赎”的叙事，将对自然的敬畏与共生理念融入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中，为人类应对生态危机提供了科幻层面的思想借鉴。这些情节传递着赫伯特对生态文明的倡导——人类应树立正确生态观，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唯有如此，人类文明才能可持续发展。

（三）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自由意志与命运的博弈

《沙丘》三部曲通过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深刻探讨人类命运的核心问题——自由意志与命运的博弈，展现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挣扎与坚守，传递“人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核心思想。

保罗与雷托二世均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能看到未来的无数可能性，却也被命运枷锁束缚。保罗预见圣战的灾难，却无法摆脱命运，只能被迫接受；雷托二世预见人类文明的灭亡，为拯救人类，牺牲人性成为“神帝”，推行“金色通道”计划。这种挣扎体现了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渺小与无奈，但作品并未陷入宿命论——保罗始终努力反抗命运，试图减少灾难损失；雷托二世的牺牲是自主选择，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同时，作品通过神话重构，传递“人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思想。对弥赛亚神话的重构，打破“救世主拯救人类”的叙事，强调人类自身的力量；对创世神话的重构，打破“神本主义”，强调人类主观能动性，凸显人类通过自身努力建构文明、掌握命运的能力。这种思考体现了赫伯特的人文主义思想，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启示——人类应坚守自由意志，勇敢面对命运挑战，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超越与文明进步。

结论

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三部曲，以遥远未来的星际文明为载体，构建了涵盖自然符号、人造符号与人物符号的庞大宗教符号体系，对弥赛亚、英雄之旅、创世等东西方经典神话原型进行创造性重构，打造了兼具宗教哲思、政治隐喻与生态理念的科幻史诗。研究表明，《沙丘》三部曲的宗教符号体系，各符号相互关联、承载深厚文化内涵，自然符号体现生态与信仰的共生，人造符号体现教义与权力的话语建构，人物符号体现信仰与命运的具象表达；其神话重构通过“原型借用—语境转化—内涵延伸”的策略，实现了弥赛亚神话从“救赎”到“异化”、英雄之旅神话从“个人英雄”到“文明觉醒”、创世神话从“神创世界”到“人创文明”的突破；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的协同作用，不仅

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更传递了赫伯特对信仰本质、权力博弈、生态文明与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重要借鉴。神话是人类解读世界、传递价值的重要载体，《沙丘》三部曲通过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将科幻叙事与文化反思相结合，既完成了对传统神话的解构与超越，也实现了神话意识形态的创造性表达，为科幻文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范本。这种方式丰富了科幻文学的创作手法与思想内涵，证明科幻文学可兼具科技奇观与深厚文化、哲学思考，实现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沙丘》三部曲之后还有《沙丘神帝》（*God Emperor of Dune*, 1981）、《沙丘异端》（*Heretics of Dune*, 1981）、《圣殿沙丘》（*Chapterhouse: Dune*, 1985）等续作，将来可从多维度、跨学科方向拓展，构建更立体的研究体系。多维度包括跨文本研究维度，梳理《沙丘》系列作品中宗教符号与神话原型在整个沙丘宇宙中的传承、演变与突破，探讨保罗、雷托二世的人物符号延续性，以及“金色通道”计划在后续作品中的叙事延伸，揭示赫伯特科幻思想的整体性与发展性。跨学科方面可以结合生态批评理论，深入挖掘自然宗教符号背后的生态伦理内涵，探讨作品生态叙事与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呼应关系；结合政治哲学理论，剖析人造宗教符号与权力话语的建构逻辑，解读作品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批判价值；结合后人文主义理论，进一步分析人物符号的“非人化”特征，探讨作品对“人”的本质、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深层思考，实现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深度对话。未来研究也可突破现有主流元素的研究局限，聚焦作品中被忽视的边缘化宗教符号（如帝国其他宗教流派的符号体系）、小众神话原型（如弗雷曼人部落内部的民间神话），以及次要人物（如弗雷曼人领袖、帝国贵族）的符号意义，挖掘其在叙事推进、主题表达中的隐性价值，丰富《沙丘》系列的文化解读维度。

《沙丘》系列作为科幻文学的不朽经典，其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思想价值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延展性，未来的研究可通过多视角、多学科的探索，进一步挖掘作品的深层价值，推动科幻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同时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更多源自科幻文本的思想滋养与实践借鉴。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Jiang Yume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6-0919-3154>

References

罗兰·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Barthes, Roland (1999). *Mythologies*, trans. Xu Qiangqiang & Xu qiling.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Bloom, Harold (1994).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约瑟夫·坎贝尔（2000）：《千面英雄》，张承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Campbell, Joseph (2000).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trans. Zhang Chengy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Frye, Northrop (1957).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弗兰克·赫伯特 (2024a)：《沙丘》，顾备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Herbert, Frank (2024a). *Dune*, trans. Gu Bei.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弗兰克·赫伯特 (2024b)：《沙丘救世主》，苏益群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Herbert, Frank (2024b). *Dune Messiah*, trans. Su Yiqun.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弗兰克·赫伯特 (2024c)：《沙丘之子》，张建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Herbert, Frank (2024c). *Children of Dune*, trans. Zhang Jiangua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霍盛亚 (2025)：“神话与科幻的跨文类生成研究：边界流动与符号共生”，《社会科学研究》(06)：213-221。

[Huo Shengya (2025). “Boundary Fluidity and Semiotic Symbiosis: A Study of Cross-Genre Formation Between Myth and Science Fic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06): 213–221.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4769.2025.06.022>]

黄悦 (2020)：“试论科幻文学中科学与神话的共生关系”，《贵州社会科学》(04)：39-44。

[Huang Yue (2020). “On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mythology i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04): 39-44. DOI: <https://doi.org/10.13713/j.cnki.cssci.2020.04.006>]

Kennedy, Kara (2021). *Spice and Ecology in Herbert's Dune: Altering the Mind and the Planet*.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04): 444-461. DOI: <https://doi.org/10.1353/sfs.2021.0079>

Kennedy, Kara (2022). *Frank Herbert's Dune: A critical companion*. Springer.

李俊义 (2022)：“从《沙丘》看科幻电影象征叙事的本体与建构”，《电影评介》(04)：40-43。

[Li Junyi (2022). “On the ontology and construction of symbolic narration in sci-fi mov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ne*.” *Movie Review* (04): 40-43. DOI: <https://doi.org/10.16583/j.cnki.52-1014/j.2022.04.008>]

Nicholas, James (2011). *Dune and Philosophy: Minds, Monads, and Muad'dib*. Open Court.

Senior, William A (2007). “Frank Herbert's Prescience: Dune and the Modern World.” *Journal of the Fantastic in the Arts* (04): 317-320.

Smith, Tara B. M.(2024). “The Ox's Tail: Reading Frank Herbert's *Dune* as a Zen Buddhist Koan.” *Journal for the Academic Study of Religion* (03): 320-338. DOI: <https://doi.org/10.1558/jasr.27044>

魏悦、何敏 (2021)：“后人文语境下美国科幻小说对‘人’的书写——以“沙丘三部曲”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66-73。

[Wei Yue, He Min(2021). “The Wring of ‘Human’ in a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in the Post-Humanistic Context: Taking Dune Trilogy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03): 66-73.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539.2021.03.010>]